

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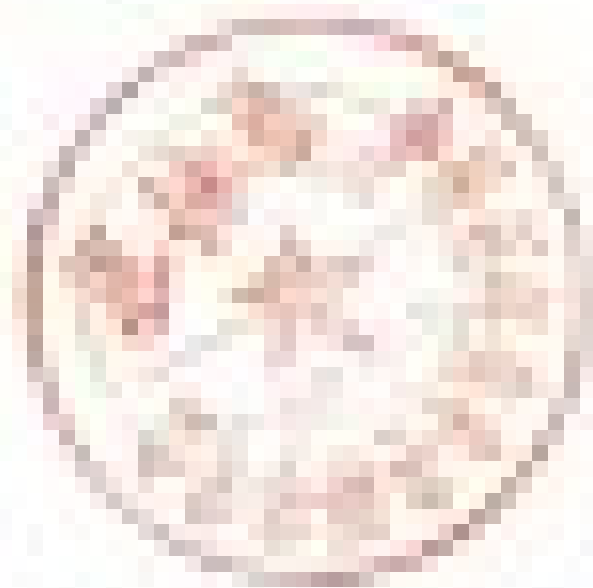
第四輯

青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大史資料

第四卷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47147/53

文史資料

第四輯

青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文史资料 第四辑 目 录

回忆王尽美与邓恩铭.....	王蔚明	1
王尽美的一次青岛之行.....	杨德文	25
回忆王荷波和京东暴动.....	王蔚明	28
民主革命战士——陈干.....	民革青岛市委文史组	34
南掖抗日斗争片断.....	王文彬	50
回忆费县二大队的抗日斗争.....	滕 胜	60
胶县第一支革命武装.....	韩育民	65
回忆孙家口伏击战和曹直正殉国.....	郑荷订	70
关于青岛中纺公司工作的回忆.....	范澄川	75
解放前夕青岛师范学校护校记实.....	王桂浑	102
解放前夕自来水厂护厂工作片断.....	刘汉耀	113
解放前夕市传染病院的护院及其他.....	姜维翰	118
费筱芝之死.....	邓余鸿	125
救生记.....	戚志诚	128
忆荒岛书店.....	宁修本	135
羁押中的张学良.....	韩庆洵	137
张学良台北访沈鸿烈.....	宁修本	145

青岛时报之产生、变迁及其他·····	王弘仁	149
青岛时报兴亡概况·····	张凌云	155
日伪时期青岛见闻之点滴·····	王第荣、张凌云	162
我所知道的川岛芳子·····	王文涛	169
关于韩复榘的另一部分史料·····	梅 枫	178

回忆王尽美与邓恩铭

王 蔚 明

编者按：王蔚明同志系胶县师范学校教导主任，现已离休。

我与王尽美同志初次相识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

那时，我在诸城县枳沟乡立高等小学一年级上学，经常到郑家菜园去。郑家菜园主人郑明训，是当地一位反清复明的隐士。据说，这位老人的先辈曾与顾亭林、丁野鹤、杨水新、张石民等反清复明的志士有交往。这些人虽然反清复明的“壮志”未酬，但是他们的心愿总想传于后代，所以直至郑明训仍然留全发，束发穿过帽子上方的园孔，用簪子绾起来，活象道士。这位老人正是王尽美同志的姑父。

郑家菜园在枳沟大街东头，东阁子以东。坐北朝南，临街有三间茅屋，东头有一间过道，前门临街，后门通向内院。院内地面宽阔，有几亩空地，种着各种蔬菜，菜地以北是郑家住宅。临街的过道就是他们摆菜摊的地方，西边两间屋里有桌有炕，并放着锨、镢、锄、镰各种农具、各种菜种、打水用的辘轳和水桶等物。菜园的大门上一付对联非常别致，上联是“知我欲寻诸葛菜”，下联是“羨君如在百花洲”。别家的门对年年更新，他们这付门对是刻上的，是用黑漆漆好的凸起的草书，书法遒劲，年年如旧，并不改动。

据说这是一位先辈的挚友来访时赠给的。园主人非常珍重，故刻在门上永留纪念。

我和一些同学之所以好去郑家菜园买菜，一是因为无论阴、晴、早、晚或街上无菜可买时，他那里都有菜，即使摊上的菜已卖尽，也可到地里去拔去摘。二是因为郑家对人和气，菜也洗得干净，卖价公道，不需论价。三是郑家虽已家道不富，但还是诗书人家，在顾客不多的时候，常常彼此交谈，上下古今，无所不及，日子长了，也就成了朋友了。

1919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课后，我到郑家菜园来，适逢菜园主人的儿子郑炜昭（通常我称他郑大哥）正在和一位青年闲谈。见我进门，他们起立相迎。郑大哥指着尽美对我说：“这是我的表弟王瑞俊，他是北杏人，现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作为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到诸城县发动学生组织学生会，反日救国，顺便回家探亲……”又指着我对尽美同志说：“这是王为铭老弟，他家是王家楼子，他是王乐平先生的令侄，是这里高小一年级的 高才生……”接着王尽美同志对我说：“真凑巧，与你在这里相遇。王乐平先生是革命的老前辈，我在济南常看到他，这次爱国运动，他是积极支持者。我们虽是初次相见，也可说早就是间接的朋友了。”我问他济南学生运动及他到诸城发动学生的经过情形，他谈了北京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向北京政府请愿惩办卖国贼及通电全国呼吁各地同胞共同奋斗，电请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拒绝签字。济南学生和全国各地学生一样，响应北京学生的呼吁，已组织起学生会来。现在已经发展成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共同行动。以及到诸城时得到当地一些教

育界爱国人士的帮助，工作顺利的情形，并讲了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道理。

我当时是十三岁的小学生，从来没有人这样郑重其事地和我谈论国家大事。虽然我在学校里也很关心时事，爱看报纸和进步刊物，但听到王尽美同志这些言论，仍有耳目一新，顿开茅塞的感觉，感到异常亲切和温暖。

最后，我请他到我们枳沟高小去召集同学开个会，也把学生会组织起来，抵制日货，宣传救国，他拒绝了。他说：

“在家臭和尚，出门一棚僧；你们那里北杏学生就不少，他们会说：‘那不是××那个臭小子，才出去几天，倒装模作样说起国家大事来了。’我有那些工夫，还不如到个生地方，费些唇舌，发生更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些地主少爷们，更瞧不起我们这些穷小子。”我再三要求他去，并说：

“现在的代理校长王立哉是我五叔，我可以说服他召集学生开会，请你讲话。”他说：“不用了，我从诸城来时，已请诸城学生会派代表到各乡镇各小学去组织学生会参加爱国运动，估计不久就会有人到你们这里来的。救国是全国人民共同的事业，参加的人越多，力量越大，应该让更多的人有参加运动的机会。这样才能使他们在实践活动中，锻炼成长为革命干材，为国效力。一个人的本事再大，对救国大业来说，也只是沧海一粟，是微不足道的。应该层层发动，不能包办代替，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让诸城学联派代表来你们这里发动才好。”我听他说得很有道理，便不再坚持。因为贪恋与王尽美同志交谈，这天，我提着大葱回到学校，已经暮色苍茫，别的同学已经吃过晚饭多时了。

两天以后的午休时，我看到王尽美同志已经来到我

们小学，正与他熟悉的北杏同学在教室前面说话，我便约他到我屋里去坐坐。他看到我的桌上有《新青年》、《新潮》、《新生活》等刊物时说：“在这乡村的小学里，也能看到这些进步的刊物，可真不易呀！”我说：“我没钱订阅书报，这些，都是从老师和同学手里借来的，都是别人看过以后，过时的东西了。”他说：“不，这些刊物中的文章，过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再看，也不过时。当然，他们的话也不会全是金科玉律，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很重要的，他们提出的意见，也往往是值得研究、参考的。我主要也是借阅别人的书报，我有这个感觉。”他问我这些书是从谁手里借来的，要我同他去找这些人谈谈。交谈过后，才向我告别，说他即将回济南去，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我积极参加爱国运动。

王尽美同志走后，又过了两天，诸城县学联派了两位代表到我校来，一个是徐宝梯（后改名陶钝，现任全国曲协主席），另一位是陈宝琨（解放后在胶县邮电局当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两人都是诸城县立观海小学的学生。我校代理校长王立哉召集全校同学开会，让他们讲了话。他们讲话以后，王立哉与初级班主任庄耀南也发言表示支持，他俩都是尽美同志来校时交谈过的。

会后，枳沟学生会与商会联合成立了枳沟各界救国联合会，印发宣言传单，限期禁绝日货，禁运内地物资出口资敌。学生停课，组成十人团分成两帮，逢集的日子一帮到集上宣传，一帮到通往青岛的大路去检查日货，检查贩运粮、棉、花生等物资；不逢集的日子就分日夜两帮分别到大小路口去检查，按其他地区已经采用的办法，在限期以内第一次查到的

日货加印标记发还，并告以抵制日货的必要，如第二次查到就没收。对第一次查到的外流物资，按当地市价降价迫卖，第二次再犯亦以没收等办法处理。虽到放暑假的时候，学校亦未宣布放假，学生还是坚持工作。开始查到的日货，曾在逢集的日子堆在南河滩上当众焚烧了一次，以后商会会长赵贡南提议说：“日货是中国人花钱买来的，这样烧了，实在可惜，不如把它存放起来，用它救济贫民或作其他公益事业。”大家觉得他说得有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查到的日货便不再烧了，都送到商会会长赵贡南所在商号“瑞复兴”去存放起来。我们每去存放一次都在存储册上进行登记，也看到仓库里的日货积存日多，到今年九月间，三间大屋，上着屋梁下触地，放得满满的快放不下了。但是下一次去存货时，屋里的货一点也没有了。同学们不知货物去向，问店内人员都说不知道，找赵贡南，他们说不在家，从此赵贡南竟不见了。我们问学生会的会长和委员，也都说不知道。但不久以后，学生会长王乔年、委员王长令也都不见了。据与他俩同村的西安庄同学说，他俩在运动中吸鸦片成瘾，回家变卖家产，弃家闯关东去了。这回赵贡南又露面了，他说他出去办货不在家，把责任全部推到了王乔年和王长令身上。

到寒假时，代理校长王立哉、初级主任庄耀南都辞职了。但他们并没说为什么辞职。我在放假前去给庄耀南老师送书，他说：“我向你们告别了。明年我和王校长都不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怂恿同学们起来爱国，同学们废寝忘食，奔走呼号，餐风沐雨，辛苦了半年，结果黑白不明；有的同学甚至失足落水，流落他乡。这是一次惨痛

的失败，实在对不起同学们。”他俩似乎是既不敢彻查究竟，与地方豪绅为敌，又不甘心受污辱，无所表示。同学们愤愤不平，就更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了。

这次爱国运动就这样结束了。

1923年5月，我在青州山东省立第四师范上学，在青岛《胶澳日报》副刊征文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时，我写了一篇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为题的文章。被采用后，副刊主编邓恩铭同志给我一封信大加赞扬，请继续投稿，并说明不几天后将到青州面谈。

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邓恩铭同志果然到青州师范来了，并带来了《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共产党宣言》等文件相赠。这些文件都是莫斯科印制的，想必来之不易。在交谈中，他说他是贵州省荔波县人，是苗族（现在有些文件说他是水族，与他的自叙不符）中的熟苗（注一）。他解释说，生苗仍住在深山老林，熟苗已与汉族同化，识汉文，说汉语。他的舅父黄泽沛，在山东已多年，没有儿子想以他为继子（注二），所以带他到山东来。他曾在济南山东省立一中上学，他的舅父当时是益都县知事，所以他常到益都来，他舅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黄伯云。

在他问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过时，我谈到1919年王瑞俊代表省学联到诸城时与我相遇及交谈的情况，这次投稿也是采用了他对我谈话中的一些意见。我只读过《新青年》等刊物中的文章，没见过马克思专著……邓恩铭同志因此也谈到五四运动时王瑞俊是第一师范学生会的代表，他是一中代表，及他们共同活动的情况，但他没有透露王尽美这个名字。

从此以后，每隔一两个月他就到青州一次，每次都到青

州师范来与我交谈，有时还带本新书赠我。常常是交流学习情况，谈论国内时局及世界形势，有时也询及校内同学及老师们的思想动向。当时，我们四师同学中有个读书会。读书会的缘起是因为上师范的学生大都是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中学的人，各人自己订购较多的书报是有困难的，学校里又没有图书馆，阅报室里的报刊很少，所以我们常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便相约订购不同的书报，互相借阅。为了借阅方便，我们订了一个图书登记簿，每一本书刊各占一页，书刊传入谁手，随时登记，一查便知。最初只有四五人参加，分别订购了《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周报》、《新建设》、《学生杂志》等期刊和《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社会发展史》等。我们几个人自习在一个屋里，睡眠也在一个寝室，课余、饭后，互相交谈，自然地形成了不定时的读书座谈会。后来，加入的人逐渐增多，会员包括不同班和不同年级。只靠这样自然形成的座谈会，便觉不大满足，我们便在愚公堂两侧，出了一种墙报叫《读书会报》，交流读书心得或提出疑难问题。会报开始先公布了《读书会章程》，章程规定，凡是自愿订购一种期刊或一本图书供会员传阅的同学，都可登记为会员，会员有通过语言和文字交流学习心得的权利和义务。读书会报不定期，会员的读书心得和疑难问题可随时抄写清楚，随时贴出，不加限制，作者要在文后签名，注明月日，文责自负。每个会员如果认为必要时可随时提出题目、约定时间、地点，召开读书座谈会，会员可自愿参加，人数不限多少。当时邓恩铭同志来时，我所能谈的多是有关读书会的情况。我曾几次向邓恩铭同志提到：“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了。并且已经知

道《向导》是党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是团报。有些人也想入党或入团，但不得其门而入，到底他们在那里呢？”邓恩铭同志的答复总是：“可能我们山东也有，等我找到他们时，我和你一同加入。”

1924年3月间，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恩铭同志又来看望我了。相见之后，他第一句便说：“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与王尽美同志两人共同负责介绍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我问：“谁是王尽美同志呀？他认识我吗？”“他就是五四运动时在枳沟与你交谈过的王瑞俊！”

因为在师范会客室内说话不便，他约我出去谈谈。我们边谈边走，一同到了西皇城王振千家。王振千是第十中学的国文教师，是王翔千的胞弟，他俩都是诸城相州人，而且还是我的族叔祖父，他家是我常去的地方。我们到他屋内时，正有十中学生王元昌、王元盛、王良栋（注三）在那里。这些人也是我早已熟识的，但不知他们是青年团员。经恩铭同志介绍，才知道原来是在一年以前，王翔千在十中任国文教员时就介绍了几个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几个人了，他们三人是团支部干事（当时团支部委员叫干事），特约在此与我相见。在交谈中，王振千并不回避。我问他：“你也是共产党员吗？”他说：“我这样人不配当共产党员，我吸鸦片，行动散漫，我若加入共产党会败坏党的名声。但我儿子王茂坚已经入团了，中国前途，寄托在你们身上；我自认是‘粪土之墙，不可圯也’。但我能为党保密，请同志们放心，我决不会作反对革命的事！”

在我问到王尽美同志五四以后的经历时，恩铭同志说了

很多。王振千补充说：“你这两个入团介绍人都是参加中共一大的山东代表，可真不易得呀！”我对恩铭同志说：“我认识你快一年了，现在你才介绍我入团，你只对我说你是共产党员，还不肯说你是一大代表，你可真保守呀！”恩铭同志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对我说：“党和团的建设，关系到祖国前途，现在反动势力非常猖獗，国内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屠杀革命同志，党团组织和党团员的姓名必须严守秘密，即是父母兄弟，也不能轻易泄露。这正是你入团以后必须注意的！”最后他嘱咐团支书找青年团章程给我学习，并建议让我列席团支部干事会议。待一定时间以后补选我为团支部干事，以扩大团支部的活动范围，在师范学校建立团的组织，这次会晤就结束了。

从此以后，恩铭同志再没有到师范来看我。

我第二次与王尽美同志相见是在1923年暑假。这年暑假前一个多月，忽然接到我的堂叔乐平给我来信并寄给十元路费，要我放暑假后到济南去。我到济南后就住在大布政司街齐鲁书社——当时山东国共两党共用的秘密联络点内。这个书社坐东朝西，临街有四间门面，经销各种进步图书杂志，兼营学生学习用品，生意兴隆。借图书销售工作，能与很多进步青年发生联系。门面的北头三间，除通道外是柜台书架，南头一间有园桌、园凳，是一般来宾接待室，也是店员食堂。连通门面有四间北屋是店员宿舍，院内有三间南屋，西头两间与门面通连，是书库，东头一间是伙房。店员轮流值日买粮买菜，自饮自食。伙房南边有一水井，井深不及三尺，但水清见底，有泉如串珠，足够生活需要。三间东屋是图书室，凡是书店经销过的书籍，每种都留出一本，存放在这屋里。

据乐平叔告诉我，他想日积月累，等积得图书多了，就另辟场地，开办一个图书馆。这屋的周围除门窗之外，都放着书橱，橱内的书已将近满架了。屋的中间有乒乓球台，周围有椅子、板凳、躺椅等等。其实打乒乓球的时间并不多，主要是开会、座谈用的；夜晚有客当床用。南头西窗下有一张竹床，我就睡在那里。除晚上睡眠和一日三餐外，其余时间就是看书。

这屋的墙上还挂着箫、笛、二胡、三弦各种乐器。有时，同志们来了，于座谈之前或会议之后，吹、拉、弹、唱，互相配合，自然形成一个小小的音乐会。尽美同志在这方面，特别擅长，吹拉弹唱，几乎全能；生旦净末的表情动作也都很象；旧曲新歌，他都能唱上几段；他在这里是最活跃的一个。

这屋里还备有象棋、围棋、跳棋、军棋等各种棋具。有时，不好喧闹的同志来此晤谈之后，便对奕一局，以资消遣。

一天早饭后，乐平叔与王尽美同志相继来到室内，他指尽美对我说：“这是王瑞俊同志。”又指着我对尽美说：“这是我的侄子为铭。”我说：“我们早就相识了，不过三四年不见面了……”乐平走后，我便与尽美同志追叙往事，互询别后情况，我首先谈了五四运动时枳沟学生会抵制日货的经过和结局，并说明多数同学的愤愤不平和无可如何的窘况。我问他：“象中国这样贪污腐化成风的社会，还能有救吗？靠谁挽救！”尽美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在五四运动时，我跑的地方比你多，了解的情况也多些。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抵制日货没能坚持下去，各种救国团体也都分裂或夭折了。我也曾为此苦闷好久，但我以后到北

京见过北大教授李大钊，到上海去见过上海大学的教授蔡和森——这些人的文章，我想你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早读过的了，这是全国进步青年所仰望的有学识的人。我把这个问题向他们请教过。他们以社会发展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给我解开了思想疙瘩，指出了光明的前途。”我又问他：“乐平叔称你同志，想来你现在已是国民党员了？你对国民党的现状及前途怎样看？”他说：“孙中山先生思想先进，学识渊博，大公无私，忠心为国，是令人钦佩的，我愿追随他为国尽力。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是个伟大的功绩；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完成，尚待今后努力。”我说：“你说孙中山先生大公无私，忠心为国，我很同意；至于思想先进，学识渊博，我可不能苟同。”我谈了我对孙先生的一些主张的看法后，尽美同志说：“你提的问题很大，也很复杂，我一时作不出使你满意的回答，请你允许我们以后细细地交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意见，我也颇有同感，我还得补充一点，在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提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比康梁是进步的，比一般官僚、士大夫更是进步的了。假使你我生于当时，也不一定有比孙先生更高明的思想，这叫做历史地看问题。现在十月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接受第三国际的劝告准备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这更是进步的表现。要正确评价孙中山先生和估计国民党的前途，还得看下一步走得怎样。听说苏俄代表今春已到上海与孙中山先生会谈，这倒是个好消息。”

我猜度他对国民党的看法之所以谈得不切实、不中肯，大概是因为我是王乐平的侄子。所以我便对他说：“王乐平

是我的堂叔，但我对他并不了解，他对我也无从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只见过他一次，那还是1912年麦收时，他在场上看场，我走到他的麦场上，他叫我背《三字经》《千字文》，又在地上画字给我认，我背得熟，认的准，他夸奖了一番，那时我才五六岁。以后他们全家都搬到诸城城里去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他。我这次来济南是他去信叫我来的，还寄了一包孙中山先生的著作，要我读后向他谈谈心得体会。我来后，按家族传统礼节到他家给他请安，他亲自给我搬椅子，倒茶，问寒问暖，这个开头，确实使我感到有点异样；因为在家族中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尊辈对我这样客气；说句‘壶里有茶，自己倒’就很不错了。但到吃饭时又使我产生了另一种感觉，桌上有四个菜，我觉得菜作得很可口，炊事员是一位我在家早已熟识的穷乡亲，他年近半百，站在桌旁递饭添茶，我已觉有些过意不去，可是乐平公突然拍桌而起，大发雷霆：‘你这菜是怎样做的？！’还打了炊事员两个耳光，你看，这是多么野蛮无理！

“我不信神，我也不迷信任何人，吴虞先生提出‘打倒孔老二’的口号，我也不反对。但孔子的话也不全错，我认为他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很对，我就很赞成。若说俺这位乐平大人，他还信仰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又该怎样讲呢？！”尽美同志说：“在国民党人中，象你三叔这样的，就算官僚作风较少的了，仍然如此，可见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实现三民主义，在国民党的成员问题上，也可找到原因了；但我们对这些革命前辈，还希望他们能随时代前进，思想作风能够有所转变。”这次谈话，到此为止，尽美同志就告辞了。